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前 言

“此外，凡是只教训我，而不丰富或直接激励我的行动的事物，这一切我都憎恨。”^①这是歌德的话，我们可以用这句话作为一个衷心表达出来的特见（*Ceterum censeo*）起始作历史的价值与无价值的观察。就是在这观察里应该陈述为什么没有激励的教训，为什么使行动疲萎的知识，为什么成为贵重的多余知识与奢侈的历史，我们必须严肃地按照歌德的话，要加以憎恨呢——其原因是由于我们还缺乏最必要的事物，而且多余是必要的敌人。的确，我们用得到历史，但是我们用它，与知识的花园中的娇惯的闲游者所用的不同，尽管那闲游者傲慢地俯视着我们的粗俗而无风趣的需要和切要。这就是说，我们用它是为了生活和行为，不是为了舒适地离开生活与行为，或者甚至于用以美化自私的生活和懦弱而恶劣的行为。只是在历史服务人生的范围内，我们愿意服务于它，但是有一种研究历史的情况，有一种使生活凋萎而变质的对于历史的评价：这一个现象，在我们这时代值得注意的征候上去亲身体验它，可能是很痛苦的，现在却也同样是必要的。

我努力过，去描述一个总是时常使我苦痛的感觉；当我把它公诸世间时，我也就对它泄了愤。也许有任何一个人由于听到一个这

① 见歌德 1798 年 12 月 19 日给席勒的信。《歌德书信集》第二册第 362 页。汉堡 Christian Wagner 出版社，1968 年版。——译者。

样的描述 而向我说明 他诚然也认识这个感觉 但是他说 我没有十分透彻而根本地感到它，并且完全没有以适当的准确和成熟的经验表达出来。这样说的也许有一两个人；但是大多数的人将要向我说 这是一个完全颠倒的、不自然的、可憎的、绝对不容允许的感觉，甚至说我以这个感觉显示出我与这样有声势的历史的时代趋势是相违背的，这趋势显然是自从两代人以来在德国人中间特别显著。现在无论如何由于我敢于逼真描述我的感觉，由于我给许多人机会，去吹捧一个这样的，如上所述的³时代趋势，一般的正当意识与其说是被损毁，勿宁说是被促进了。但是对于我，我却获得一些对于我比正当意识更有价值的事物——公开地对我们的时代得到教训 得到指正。

这个观察也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把一些这时代有理由引为骄傲的事物，它的历史教育，在这里要试图解释为时代的伤害和残缺，因为我甚至相信，我们都患着一个消耗的历史的寒热病，至少我们应该认识 我们在患这个病。但是如歌德说过的“我们悟到在培养自己的德行的同时，自己的弱点也随之滋长。”³①这句话有正当的道理，并且如果像人人皆知的，一个营养过度的道德——正如我觉得我们时代的历史的意识就是这种道德——能够同样像一个营养过度的罪恶，使一个民族腐败，那么就权且让我这么作罢。为了减轻我的罪名也不得不说明，这些激起我苦痛的感觉的经验多半取自我自己，只有为了比较才取自他人，并且在我是古代的，尤其是希腊时代的学徒的范围内，我只是充作现代之我的我而得到如此不合时宜的经验。但是因为我是职业的古典语言学者，我必须要求被允许说上面这些话：因为我不大知道，古典的语言学在我

见《歌德自传——诗与真》下册 第 614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版。——译者

们的时代会有一个什么意义，若不是有这个意义，它在这时代里不合时宜地发生影响——这就是说反对这时代，由此而影响这时代，并且希望有利于一个将来的时代。

—

你看看在你旁边游牧的畜群罢：它们不知道什么是昨天，什么是今天 到处乱跳 吃草 休息 消化了又跳 就这样从早晨到夜里，一天又一天，和它们的快乐与不快密切相连，这就是系在瞬间的柱子上，所以它们是既不忧郁，也不厌倦。观看这情形使人感到难过，因为在动物面前他自傲他是人类，可是怀着嫉妒去看动物的幸福——他只愿望像动物似地既不厌倦也不在痛苦中生活，可是他徒然地愿望着，因为他不愿意和动物一样生活。人们假如问动物：你为什么不向我述说你的幸福，而只是看着我呢？动物也愿意回答，并且要说：这是这个原故，我总立刻就忘记我所要说的话——但是在这时它也已经忘却这个回答，它沉默着：致使人对此感到惊奇。

但是他对于他自己也惊奇，他不能学习忘记，并且永远与过去的事物联系着。无论他跑得多么远，多么快，这锁链也跟着一齐跑。这是一个奇迹 瞬间是倏然而至 倏然过去 前此是一个虚无 过后是一个虚无，可是它还充作鬼魂回来，而且破坏一个后来的瞬间的安宁。从时间的书卷中不间断地脱开一页，它掉落出来，翩翩飘去——忽然又飘回来 落在人的怀里。于是人说：“我回忆”同时羡慕动物，它立刻就忘记，它看着每瞬间都真正地死去，沉入雾和夜里，并且永久消灭。动物就这样无历史地生活着，因为它在眼前消除像是一个除得尽的数目，不剩下一个奇特的余数，它不会装假，无所隐藏，在每一瞬间它都完全显现出它是什么，所以它绝对不能与本来面目不同。人却支撑着过去事物的庞大的而且越来越大的担负：这担负把他压倒，或是把他压歪，它是一个看不见的、阴暗的重担，

使他的步履艰难，他在外表上好像有时能够否认这个重担，他在和他同类人交往时甚至太喜欢否认它：为的是唤起他们的羡慕。若是他看到游牧着的畜群，或是较亲昵地看着小孩，这小孩还没有过去的事物必须否认，在过去和将来的篱笆中间，在过分幸福的盲目中游戏着，于是他就感动了，好像记起一个失掉了的乐园一般。可是小孩的游戏也必须被扰乱；就是在过早的时候它就从忘记里被呼唤出来。他就学着去了解“从先是”这句话这是一个通行口号，斗争、苦难和厌倦都随着它走到人这里来，它使人想到他的生存根本是什么——是一个永久不能完成的过去式。若是最后死亡带来了人所热望的忘记，可是它同时也就把现在和生存都给夺去，并且以此封印了那个认识——生存只是一个永不间断的“曾是”，只是一个事物，它生活在否定自己，消蚀自己，自相矛盾里。

若是一个幸福，若是一个向着新的幸福的追求，在任何一个意义中正是那把生活者牢牢地固定于生活里又把他向着生活推进的事物，那么也许没有一个哲学家比犬儒学者^①更有道理了，因为动物的幸福也就是完成了的犬儒学者的幸福，对于犬儒主义的道理是活的证明。那最小的幸福，只要它不间断地存在，并且使人幸福，它就无比地比最大的幸福还幸福，倘若这最大的幸福只成为一段插话，似乎是一时的兴会，疯狂的奇想，出现于尽是不快、欲望和缺乏的中间。但在最小的幸福时与在最大的幸福时总归是这一点，由于这一点幸福成为幸福，就是“能忘记”或者说得文雅一些，就是有能量，能在一段时间内无历史地去感觉。谁不能坐在瞬间的门槛上，忘记一切过去，谁就不能像是一个胜利女神，不晕眩，不恐惧，站在一个据点上，这人将永不知道什么是幸福，说得更坏一点：他

^① 犬儒学者（Zyniker），公元前四百年雅典一个学派的信徒，他们认为人生无所要求，毁弃礼法，其中代表人为 Diogenes。——译者。

将永久不能作一些使旁人幸福的事。请你们想像这个最极端的例子 想像一个人 他完全没有忘记的能力 他好像被判决 到处看见一个“变”。一个这样的人再也不相信他自己的“存在”再也不相信他自己，他看一切都是分散为许多动点，他也自失于这个变的河流中：他将如赫拉克利特 的真正的弟子，最后似乎再也不敢举一举他的手指。一切的行为中也有忘记：正如一切有机物的生命不是仅需要光明，却也需要黑暗。一个人若是从始到终只要历史地感觉，他就要和一个被迫不能睡眠的人相似，或者像那只是仗着反刍和永远一再的反刍来继续生活的动物一般。所以，这是可能的，几乎没有回忆去生活，而且是幸福地生活，就像动物所表现的那样；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绝对没有忘记还能生活。或者，更简单地说明我的题目 失眠、反刍、历史的意识 都有一个度数，一到这个度数，凡生者就要走向损害之途，最后归诸沦亡，不管这生者是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文化。

为了规定这个度数，然后由于这度数，规定一个边界，在这边界上过去的事物必须被忘记，如果过去的事物不应该成为现在的事物的掩埋者，那么我们就必须确切地知道，一个人的、一个民族的、一个文化的造型的力量有多么大，我所说的是那个力量：从自身独特地生长、改造过去的和陌生的事物，并化为己有，治愈创伤，补充遗失，再造出已经破碎的形式。有些人很少据有这个力量，致使他们为了一个唯一的经历，为了一个唯一的痛苦，常常甚而为了一个唯一的微弱的枉结，像是为了一个非常细小的流血的伤口，就会不可医治地血流不止；另一方面又有这样的人，纵使最粗野的和最恐怖的生活事故，甚至是自己的罪恶行为，很少使他们感到伤

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公元前五百年的希腊思想家，认火为万物之原，谓万物之现象皆相对而流动，认流动为宇宙之原则。——译者。

害，致使他们在事件中或在事过不久，就把这些化为堪忍的相安无事与一种良心的平静了。一个人最内在的天性的根子越深越粗，他也就能更多地从过去有所获得，或强为己有；如果我们想像天性最强有力的人物，我们就会由此认识这个人物，即对于他将要绝对没有历史意识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历史的意识能够弥漫滋长而且有害地发生作用；他会把一切过去的事物，自己的和别人的，引到自己身边，吸入自己身内，似乎化为血液。凡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不能克服的，他会把它忘记；这种事物不存在了，视界完整地封闭住，没有东西能使他想到，在视界的那边还有人物、热情、学说、目的。而且这是一个普通的法则；每个生物只能在一个视界之内健康、强壮、繁殖；若是它不能在自己周围划一个视界，而且又太只顾自己，不能在一个陌生的视界内封闭住自己的眼光，那么它就衰损或过速地向着早临的沉沦衰弱下去。爽快、纯洁的良心 快乐的行为 对于来者的信任 —— 不管是个人，或是民族，这一切都系之于下面的情形：第一是，有一条线，这条线从蒙昧和黑暗里分别出清晰，光明；第二是，人在适当的时候会忘记，正如人在适当的时候会回忆一样 第三是 人以强烈的本能感觉出来 什么时候是必要的 历史地去感觉 什么时候是必要的 无历史地去感觉。这正是这定律 请读者来观察：无历史的和历史的是同样地对于一个个人的、一个民族的和文化的健康是必要的。

这里于是每个人最先带来一个观察：一个人的历史的知识和感觉能够很被限制，他的视界能够像一个阿尔卑斯山谷的居民视界一样狭窄，他可以在每个判断上不公正，在每个经验上有这种错误，以为他是第一个人有那个经验 —— 虽然有一切的不公正和一切的错误，可是他挺立在不可征服的健康和强壮中，使每个看到他的人高兴；反而紧紧在他身旁就有比他公正得多，学识比他高得多的人在憔悴，在衰弱，因为他的视线总是从新不稳定地移动着，因

为他不能从他的正义的和真理的十分脆弱的网里摆脱出来，再转向坚强的愿望和欲望。我们反过来看动物，它是完全无历史的，似乎住在一个点状的视界内，可是生活在某种幸福里，至少没有厌倦和假装；所以我们必须把那在一个一定的度数里能够无历史地去感觉的能力认作是更重要的，更根本的能力，只要在这能力里有基础，在这基础上才能生长一些正当的、健康的和伟大的、一些真正人性的事物。无历史与一个蒙盖着的气氛相似，唯独在这气氛里产生出生命，这生命又随着这个气氛的毁灭而消逝。这是真的：只有由于下面的情形人才成其为人，人思想着，考虑着，比较着，分析着，综合着去限制那无历史的元素，只有由于在那周围环绕着的烟云内兴起一条明亮的、闪烁的光辉，——也就是由于这种力，把过去的事物运用于人生，并且以已经发生的事再作成历史，人才成其为人。但是在一个历史的过程里，人又不成其为人了，若没有无历史的那个蒙盖，他就永不会开始，而且不敢开始。什么地方有人所能作的事业呢，若是人前此并未曾走入那个无历史的雾层？或者我们把这些图像抛在一边，且通过实例作个说明：我们姑且想像一个男人，他为一个女人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被一个激烈的热情所颠倒，所牵引，他的世界对他就要怎样改变啊！向后回顾，他一无所见，向旁倾听，他听取生疏的事物像是一个沉闷的、意义空洞的声音。凡是正在感觉到的，他从来没有觉得这样真实，这样切近，有色有声，有光彩，仿佛他用一切的官能同时感受。一切的评价都改变了，贬损了，所以许多事物他再也不能估量，因为他似乎再也不能感觉到。他自问，他是否这么久为旁人的语言和旁人的意见所愚弄，他惊奇，他的记忆不懈怠地在一个圈子里旋转，可是太软弱、太疲倦，不能一跃而跳出这个圈子。这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状况，狭隘对于过去的事物不知感谢，对于危险是茫然莫睹，对于警告是充耳不闻，是一个小的活的旋涡在一个夜与忘记的死海里。可是这状

况——无历史的，全然是反历史的——不只是一个不合理的，反而是每个合理的事业的母胎；没有一个艺术家将要完成他的画，没有一个大将得到他的胜利，没有一个民族能获得他的自由，若是他们前此不曾在这样一个这样无历史的状况中热望过，努力过。正如行动者像歌德所说：“总是无良心的。”那么他也总是无知的。他为了作一件事忘却大多数的事，他对待在他后面的事物是不合理，只认识一个理，就是现在应该成就的事物的理。所以每个行动者都无限地爱他的事业，甚于这事业所应得的爱，而且那些最好的事业就产生在一个这样爱的过分里，致使它们必须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不值得这种爱，纵使它们的价值本来是不可衡量地伟大。

若是一个人能在许多事件里嗅得出，呼吸得到这个无历史的气氛，在这气氛中曾经产生过每个伟大的历史事件，那么一个这样的人也许能够以认识者的身分升到一个超历史的立场，像是尼布尔^①曾经把它当作历史的观察的可能的结果所描述的一般。他说，“清楚而详细地来看历史至少对于一件事是有益的。人们知道，纵使是我们人类的才智之士也不知道，他们的眼睛是怎样偶然地得到了这个形式，他们用它看，并且强制地要求每个人用它看，强制，就是因为他们意识的深度超乎寻常地大。谁若不完全确定地并且在许多事件里知道而理解了这个情形，谁就会被一个强有力的伟人的出现所压服，这位伟人把最高的热情纳入一个现成的形式里。”一个这样的立场可以叫作超历史的，因为一个站在这立场上的人会绝对不能再感到永存不朽与名列史乘的引诱，因为他认识了一切事业的这一个条件，在行动者的心灵里的那个盲从与不公正。他也许自己治好了这个从现在起还把历史看得过分严肃的病，如果他已经知道，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个经验上，无论是在希腊人

① 尼布尔（Niebuhr, 1776—1831），德国历史学家兼政治家。——译者。

或是土耳其人中间，不管是在第一世纪或第十九世纪的一个时辰内，都会解答这个问题，怎样生活，为什么生活。谁若是问他的熟人，他们是否愿望把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再生活一遍，他就容易认清，在这些熟人中谁是立在那个超历史的立场上，诚然他们大半都回答否字，但是他们将要不同的理由解说那个否字。一部分人也许以此自慰：“但是将来的二十年将要好一些”；那就是大卫·休谟^①用嘲笑的口吻所说的这些人：

从生活的渣滓里希望得到，

初次活泼的竞走所不能给与的事物。

我们要把他们叫作历史的人；向过去的观看迫使他们走向将来，鼓励他们的勇气，更长久地与生活较力，燃起希望，认为公正的事物还会来，幸福正坐在他们正走上去的山的后边。这些历史的人相信生存的意义在它“程序”的过程中更会显现出来。他们只因此才回顾，俾使在对于一向的程序的观察上了解现在，并且学习着更热烈地渴望将来。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虽然有他们一切的历史，可是思想与行事是怎样无历史的，而且他们虽然研究历史，却不是服务于纯粹的认识，而是服务于生活。

那个问题我们已经得到了它的第一个解答，但是也能有一个另外的回答。诚然又是用一个否字——但是用基于另外一个理由的否字。用超历史的人的否字，他在程序中看不见救治，对于他，世界在每一个单独的瞬间都完结了，达到它的结束。再来十年怎么能够说明过去十年所不能说明的事物呢！

现在不管这学说的意义是幸福或是断念，是道德或是忏悔，超历史的人们关于这些彼此从不曾一致过，但是与过去所有的历史

^① 大卫·休谟 (David Hume, 1711—1776) 英国思想家兼史学家 英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译者。

的观察方法唱对台戏，他们都完全一致这样说：过去的与现在的，是一个而且是同一事物，就是它在一切的复杂中是典型地相同 并且当作永不消逝的典型的遍在，它是不变的价值与永久同样意义的一个静止的图像。正如百种不同的语言适应于人们同样的典型固定的需要，以致一个理解这些需要的人，从一切语言中不会再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学到。那超历史的思想家就从历史里明了各民族与许多个人的一切历史，透视着猜出不同的象征文字的原始意义，渐渐甚至厌倦地躲避着一再新颖地汹涌而来的象形字，因为在事件发生的无穷尽的充溢中，他怎能不饱，不过分地饱，甚至不作呕呢！致使最大胆的人最后也许准备随同基阿克摩·雷渥瑟尔笛 向他的心里说：

“没有活着的事物配得上

你的感动，地球值不得一声叹息。

痛苦与无聊是我们的存在，粪土是世界——没有别的。

你安心吧。，，

可是我们把他们的嫌憎与他们的智慧让给这些超历史的人们吧。现在我们却宁愿衷心喜欢我们的不智，并且充作行动者与前进者，充作人类进程的尊敬者，快乐地过我们的日子吧。可能我们对于历史的事物的重视只是一个西方的成见，只要我们至少在这些成见内前进而不静止！只要我们越来越较好地学习研究历史，为了人生的目的！我们愿意承认超历史的人们，他们比我们据有更多的智慧；只要我们能确信，我们比他们据有更多的人生，因为这样无论如何我们的不智将要比他们的智慧有更多的将来。为了使关于人生与智慧的对立的意义丝毫不容怀疑，我愿意通过一个从古以来

① 基阿克摩·雷渥瑟尔笛（Giacomo Leopardi 1793—1837），意大利悲观诗人。——译者

屡试不爽的方法得到帮助，简捷地提出几个论题。

一个历史的现象若是纯粹而完整地认识并且转化为一个认识的现象，它对于认识了它的人是死的，因为这人在这现象中认识了妄想，不合理，盲目的热情，以及那个现象的整个的人世间四围黑暗的视线，同时还在其中认识了它的历史的威力。这个威力如今对于一个知者，成为无力的了；也许对于一个生活者，还不是无力的。

历史被认作纯粹的科学，成为至上的，也许对于人类是一种人生的终结与清算。历史的教育反而只在跟随着一个有力的、新的生命潮流，例如跟随着一个正在演变着的文化时，是一些治疗的与将来有希望的事物，即是说，如果它被一个较高的力量所支配，所引导，而不是它自己支配着、引导着。

历史，在它服务于人生的范围内，它就服务于一个无历史的威力，所以在这个从属地位中它将要永久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例如像数学那样的纯粹科学。但是人生到底需要历史的服务到怎样的程度，这个问题是关于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健康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与忧虑的问题。因为在历史某一种的过量时，人生就会破碎而变质，最后又由于这个变质，就是历史也破碎而变质了。

二

但是人生需要历史的服务，这必须同样清楚地被理解，正如后来将要证明的这定律——一个历史的过量有害于生者。历史在三种关系里属于生者：它属于行动者与努力奋斗者，属于保存者与尊敬者，属于受难者与需要解放者。与这三种关系相应的有三种历史：在可能的范围内，可以把历史分成一种纪念的，一种好古的与一种批判的。

历史特别是属于行动者与有力者，他从事于一个大的奋斗，需要模范、师表、安慰者，可是这些在他的同辈中间与他的时代里他

不能得到。历史对于席勒 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时代是这样坏，歌德说，诗人在四围的人世中再也遇不到可以有用的人物。例如波立比乌斯 指着行动者说，把政治历史称为统治一个国家的正当的预备，称为最优越的教师，这教师通过使我们记起他人的不幸事故警戒我们，坚忍地担受祸福的交替。谁真认识了历史的意义，再看到好奇的旅客，或是可怜的小学究，在伟大的过去时代的金字塔上攀登，就必定感到不快，在那里，他得到效法与改善的鼓励之处，他不愿意遇到闲散的游人，这游人贪求着消遣或激动，好像在一个画院里无数的名画中间徘徊。行动者在这些怯弱的、没有希望的闲散的游人中间，在这些好像是有作为的，事实上只是被激动而蠢动着的同时代人中间。要不沮丧，也不感到恶心的话，他就向身后看，中断走向他的目的的行程，好喘一喘气。而他的目的是任何一个幸福，也许不是他自己的，时常是一个民族的或是整个人类的幸福；他回避断念，运用历史当作抵制断念的方法。若不是荣誉，大半就没有报酬向他招手了，所谓荣誉就是对于历史的庙堂里一个尊荣地位的继承权，在那里他自己又能够是后来者的师表，安慰者与警戒者。因为他的原则是：凡是曾经一次可能把“人”这个概念扩张而更美好地充实起来的事也必须永久存在，使之永久可能。这些伟大的时刻在一些个人的奋斗中组成一个锁链，在这些时刻里经过几千年连结成一道人类的山脉，一个这样长久过去的时刻的最高峰对于我还是生动的、明亮的、伟大的——这是在人道信仰中的基本思想，这思想表明在一个纪念性的历史的要求里。但是正在这个伟大应该永在的要求上燃烧起最可怕的斗争。因为一切其他还生活着的事物都在喊着，不。纪念的事物不应该成立——这就是对答的口

① 席勒 (Schiller, 1759—1805)，歌德同时代的伟大诗人，并精研历史。——译者

② 波立比乌斯 (Polybius) 希腊历史学家，约死于公元前 127 年。——译者

号。沉闷的习惯，渺小者与卑下者充满世界一切的角落，有若浊重的尘垢迷绕着一切的伟大，它们阻碍着，眩惑着，抑塞着，窒息着，横倒在伟大的事物向不朽所必须走的路上。但是这条路通过人的头脑！通过忧心忡忡的、生命短促的动物的头脑，他们一再为了同样的需要出现，并且辛辛苦苦争取一段暂短的时间防止自身的灭亡。因为他们眼前只是要一件事：无论如何要生活。有谁曾在他们身上预期那个纪念的历史的艰难的火炬赛跑呢，只有通过这个赛跑，伟大的事物才永垂不朽！可是总一再地有几个人醒来，他们看到过去的伟大，由于观察伟大而自强，他们自觉这样幸福，仿佛人的生活是一个壮丽的事物，仿佛这个苦味的植物的最美的果实，是去知道，从先有一个人以骄傲与强壮，另一个人以深思，一个第三者以慈善与济助经过这个生存走过去了——但是都留下一个教训，便是活得最美好的人，便是不注意到生存的人。若是平庸的人这样忧郁严肃而贪欲地看待这个短促的生涯，那些伟大的人在他们的走向不朽与纪念的历史的路上就会对之付予一个奥林匹斯山上天神的笑，或至少付予一个崇高的嘲讽；他们常常怀着暗嘲走入他们的坟墓——因为在他们身上什么能够被埋葬呢！只有那些充作渣滓、废物、虚荣、兽性永久压制着他们的事物与现在归于遗忘的事物，可是他们早已蔑视这些了。但是有一件事将要活着，他们最本质的生命标记、一部著作、一个事业、一个稀有的光照、一个创造，它将要活着，因为没有一个后世能够缺少它。在这最神格化的形式里，荣誉究竟不至于是像叔本华所称的我们自私自利的最美味的食物，这是对于各时代中伟大事物的共同一致与继续不断的信仰，这是一个对于无常与世代交替的抗议。

对于过去的纪念的观察，与对于古代经典的与珍贵的事物的

① 奥林匹斯 (Olymp)，希腊山名，传为众神之所居。——译者

研究由于什么才有益于现代的人呢？他从中理解到，过去曾经有过的伟大事物，无论如何曾经一度是可能的，所以将来也会再有一次是可能的；他更勇敢地走他的道路，因为他如今战胜了他在较为怯弱的时刻里所产生的怀疑，是不是他大半要作不可能的事。我们假定有人相信，我们只需要一百个在新精神里养成而工作的、有创作能力的人，便可扫清现在正在德国成为时尚的假教育，这应当怎样使他更加坚强，如果他认识到，文艺复兴的文化是在一个这样的百人群群的肩上耸起的。

可是——为了在同样的例子上立即还学一些新的事物——那个比喻是多么流动和飘荡，多么不准确！若是它应该产生加强的作用，有多少不同的事必须在其间被忽略，过去的个性必须怎样强暴地被迫入一个普通的形式，并且为了有利于一致而打破一切尖锐的角度与线条！根本上凡是曾经有一次可能的事或许能够有第二次可能的出现，若是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的信仰是对的，在天体的星位同样时，地上必须也重演同样的现象，而且分毫不差。甚至星辰彼此间走到某一位置时，就总是一再地有一个斯多葛派学者将要和一个伊壁鸠鲁学者联合，谋杀凯撒，并且在另一位置的状况时，总是再有哥伦布将要发现美洲。只有若是地球把它的剧本每次演完第五幕又重新起始，如果同一的动机的结合，同一的危急时神仙降临（*deus ex machina*），同一的大灾祸在一定的时间内周而复始，是确定不移的，有力者就可以在完全摹拟逼真的真实里要求纪念的历史，就是在精确叙述的特有性与唯一性里要求每个事实，所以大概在天文学者没有都变成占星师以前，不会是这样的。

①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约公元前 580—约前 500）古希腊思想家 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谓数为宇宙之原则。——译者

刺杀凯撒之主谋者，一为 M. Brutus 系斯多葛派 Stoiker 学者；一为 Cassius，系伊壁鸠鲁派 Epikureer 学者。——译者

除非到那个时候，纪念的历史将用不着那不完全的真实：它将要永久使不同的事接近，化为普通，最后同科并论；它将要永久消弭动机与缘由的不同，以便牺牲原因（*causae*）而举出纪念的，也就是模范的和值得模仿的效果（*effectus*），以致人们因为它尽其可能地不顾原由，并不太夸张地可以把它称做“效果本身”的一个总集。像是许多事件的总集，这些事情将要在每个时代都发生效果。凡是在民族节日，在宗教的或战争的纪念日被庆祝的事物，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本身”。它使热心功名者不得安眠，在事业家的心上有如一张符咒，但不是因与果的真实的历史的联系（*connexus*）这联系若是完全被认识，它只是将要说明，在将来与偶然的掷骰时绝对不能再掷出一些完全相同的事物。

只要历史著作的灵魂存在于强大的推动里，而这些推动是一个有力者从历史中所能获得的，只要过去必须被叙述为值得模仿，可以模仿而有第二次的可能，它无论如何是在这样的危险里，有一些被改动、曲解得更为美好，因此而近于自由的构想；诚然是有些时代，它们绝对不能区分一个纪念的过去与一个神话的虚构，因为从这个世界里和从另一个世界里一样能够取得完全统一的刺激。所以若是对于过去的纪念的观察统治着其它的观察种类，即统治着好古的与批判的观察，那么过去本身就蒙受损害；过去中有大部分被忘记，被轻视，像一个灰色的不间断的潮水流去，只有些单独的粉饰的事实像岛屿似地显露出来，在那些就在目前的稀有人物身上有些不自然的与奇异的地方引起注意，像是毕达哥拉斯的弟子们要在他们的先生身上看出的金臀似的。这纪念的历史用比喻来眩惑：它以诱惑的相似刺激勇者鲁莽，刺激兴奋者热狂。我们

毕达哥拉斯之弟子视其师如一代之教主，故关于毕氏有无数神话式之传说，说他金臀，亦此类传说之一。——译者

若想像这个历史完全在有才能的自私者与热狂的败类的手中和头脑里 国家就要被破坏 公侯被杀戮 战争与革命就被煽动起来 而且历史的“效果本身”的数目又重新增加了，所谓效果本身就是有效果而无充足的原因。回想纪念的历史在有自力者与行动者之下，不管他们是好的或是坏的，还能够制造出这样多的损害，但如果无力者与无能者支配而运用这个历史，它该发生什么作用！

让我们举个最简单最常见的例子。我们想像那些非艺术的与艺术性薄弱的人们，被纪念的艺术家的历史披上甲冑武装起来，他们现在将要向谁施用他们的武器呢？向他们的世敌，强大的艺术人才，也就是向着这些人，只有这些人能够从那个历史里真正地学习，就是说，为人生而学习，并且把他们所学到的转变到一个提高了的实践里。这些人的路阻塞了，这些人的天空晦暗了，若是人们崇拜着偶像并且以真正的热心围着任何一个伟大过去的被人一知半解的纪念物舞蹈，好像人们要说：“你们看，这是真的实在的艺术，那些将成就的与愿望者的人们对于你们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舞蹈的人群甚至表面上据有“良好趣味”的特权，因为创造者对于只是袖手旁观的人总是居于不利的地位；如同在每个时代说风凉话的政论家总比统治着的政治家聪明、合理而考虑周详。若是人们总要把投票与过半数的习俗转用于艺术的范围，有如迫使艺术家走到美学上的无所事事者的法庭前抗辩，人们就能够预先宣誓，他将要被判罪。不是纵使，却是正因为他的法官们郑重地宣布纪念的艺术的规范（就是说，按着以前的解释，在每个时代内“发生效果”的艺术的规范）；反过来说这艺术因为是现代的，对于他们完全还不是纪念的，所以他们第一不需要，第二没有纯粹的偏好，第三正是没有历史的权威去维护这种艺术。但是他们的本能泄露给他们，艺术能够被艺术打死。纪念的艺术绝对不应该再产生，而且对此恰好用得到那曾经从过去得来纪念者的权威的事物。这就是这

些艺术行家，因为他们简直要排除艺术；他们的姿态像是医生，可是他们本是有意掺合毒药；他们这样养成他们的口味和嗜好，为的是用他们的坏习性来解释，为什么他们固执地拒绝一切呈献给他们的有养料的艺术食品。因为他们不愿意，有伟大的事物产生，他们的方法是说：“看罢，伟大事物已经在这里了！”事实上这个已经在这里的伟大者和正在产生的一样对于他们同样没有关系，关于这点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明。纪念的历史是化装的衣裳，在这衣裳内他们把他们对于同时代的有力者与伟大者的憎恨诈称为对于过去时代的有力者与伟大者的强烈钦佩，在这件衣裳内他们蒙混看把那种历史观察法的根本意义倒置在相反的意义中；不管他们是明了地知道或不知道，无论如何他们是这样做了，仿佛他们的格言是：让这些死人埋葬生者。

历史中所有的这三个种类的每一种，都只恰恰在一块适宜的土地上和在一块适宜的气候下才是正当的，在另一块土地上它就要长成荒芜的乱草。若有人要创造伟大事物而运用过去，那么他就凭借纪念的历史占领过去；谁若相反地能在习惯与敬古中坚持，他就充作好古的历史学家料理过去；只是这个人，目前的切要在压迫他的心胸，而他无论如何要摆脱这个担负，他就对于批判的历史有需要，就是判断的与定罪的历史。某些灾害是在不加考虑植物的移植中产生；批判家没有切要，好古家没有敬虔，伟大的有识者没有伟大的能力，这些都是长成为乱草，背离它自然的产地，因而成为变种的植物。

三

第二，历史就属于保存者与尊敬者了——属于这个人，他怀着忠实与爱、问他所从来、所生长的地方回顾；由于这个敬虔他也就为他的生存表示感谢。当他用慎重的手爱护那从古以来存续的事